

民主、主观经济评价与腐败感知

——基于亚洲、非洲与拉美舆情表合并数据的多层分析

李 辉 呼和那日松 唐 敏

内容提要: 文章所聚焦的问题是: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程度会对个体的腐败感知产生何种影响? 文章对亚洲、非洲和拉美三个舆情表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合并, 整合出一个包括 50 个国家在内的跨层次数据。在此基础上使用多层分析法, 研究发现民主对于腐败感知的影响具有双重作用: 在直接效应上, 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 民众腐败感知的平均水平越高; 但在调节效应上, 民主作为一种宏观制度环境, 会增强自我经济评价对腐败感知的负向影响。研究还利用实证数据证明了个体的政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个体所处的宏观制度背景所塑造的, 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对于个体的腐败感知来说可以同时展现其“严厉的”和“慈祥的”一面。

关键词: 民主 主观经济状况 腐败感知 多层分析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947(2015)03-0162-13

一、引 言

在腐败研究领域中有一个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老问题: 民主程度的提高是否会抑制一个国家的腐败蔓延。而本文则转向另外一个问题: 民主是否会影响一个国家公民对政府腐败程度的感知? 我们这么做主要基于两个理由: 第一, 如果要准确界定民主与腐败二者的关系, 首要的前提是需要对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有着精确测量。然而即便是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 这样号称可以对全球所有国家的腐败程度进行排序的指数也依然遭到了颇多质疑(Kurtz & Shrank 2007; Maria 2008; Johnston 2010)。实际上, 大部分针对腐败本身的跨国比较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 实际上研究的都是被感知的腐败, 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实际腐败率。因此, 以往对于民主和腐败关系的研究,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揭示的就是民主与一个国家国民腐败感知的关系。

作者简介: 李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呼和那日松,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唐敏,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感谢唐世平、洪永泰、陆铭、吴重庆、范勇鹏、熊易寒、包刚升、陈陆辉、刘骥等师友在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也感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白劫与范文菁同学出色的数据整理工作。当然, 文责自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东亚儒家文化圈预防腐败制度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研究”(项目编号: 11CZZ015)。

第二,民众对于腐败现象的主观感受本身就是非常值得挖掘的题目。在整个腐败研究领域,与对腐败现实的研究相比,民众对于政府腐败的“主观感受”也即“腐败感知”问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民众的腐败感知与对政府的政治信任,以及政权的合法性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朱云汉等人的研究表明,腐败会侵蚀民众对于政府的政治信任(Chang & Chu 2006)^①,赛里格森对拉美四个国家腐败感知的比较分析也发现,腐败感知的提高会降低政权的政治合法性(Pharr & Putnam 2000; Seligson 2002),对于那些刚刚完成民主转型还没有达到巩固期的“民主新生儿”来说较高的腐败感知是非常危险的东西,甚至会葬送民主的前途(Keefe 2007)。即便是对于那些有着长期民主经验的国家来说,腐败也不是那种仅仅走走走过场的小问题。瓦伦从理论上说明了腐败对于成熟民主制度来说也是具有侵蚀作用的,原因在于腐败会使得集体行动变得十分困难,而后者经常被看作是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石:“(腐败)通过滋长社会怀疑感和腐蚀社会信任与互惠,瓦解了在公民社会中民主制造社会团结的能力”(Warren 2004: 329)。瓦伦的理论在实践上很快得到了验证,戴维斯等人也发现,腐败感知可以在文化上形成一种政治怀疑主义氛围,而这种政治文化会促使公民从公共活动和参与中退出,结果是通过“重新加强许多民主国家的专家统治和委任式民主的特征”,从而弱化了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Davis, Camp & Coleman 2004: 701)。

然而目前对于腐败感知的研究并没有探索民主制度与个体腐败感知之间的关系问题,已有的文献主要停留在从个体到个体的研究,也即个体的人口学变量、媒介接触、政治价值观等对个体腐败感知的影响。而本文则希望借助多层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探讨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环境,是否会对公民的腐败感知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有显著影响的话,是加剧还是弱化了公民对于政府的腐败感知。此外,基于“腐败宽恕”理论,当个体主观经济评价(即对自己经济状况的主观预期比较好)的情况下,会适当宽恕和容忍政府的腐败行为。因此,本研究试图进一步检验,这种宽恕腐败的现象在不同民主制度环境下是否有差异,也即民主对于个体主观经济状况和腐败感知是否存在调节效应。

二、理解腐败感知: 无视腐败还是宽恕腐败?

目前,对于公民腐败感知之间差异的解释主要包括两条主要路径:一是“无视”腐败理论。这里所谓“无视”并不是真正指民众不关注腐败问题,而是指腐败是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游戏,普通公民很难接触到这个层面的内幕,因此无法对政府的腐败情况进行准确地评价。这一理论暗含这样几个推论:一是民众的腐败感知与一个国家的实际腐败状况之间应该存在明显的差异(Olken 2009; Arnold 2012)。

第二个推论是随着媒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更多的腐败丑闻被揭示出来,民众会越来越认识到腐败的严重程度,因此媒介接触是影响民众腐败感知的重要因素之一。朱

^① 但实际上在这篇文献中,朱云汉等人使用的是亚洲舆情表调查数据,他们所说的“腐败”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实际腐败程度,而是问卷中被访者对于政府腐败程度的认识——“腐败感知”,因此他们的结论应该是——腐败感知降低了民众对于政府的政治信任。

江南等人把公众腐败感知的信息来源分为两类:一是主流官方媒体的影响;二是非正式的“小道消息”的影响。结果发现,被政府控制的官方媒体降低了民众的腐败感知,但是非官方的小道消息恰恰相反,提升了民众的腐败感知(Zhu, Lu, & Shi 2012)。余致力等人则使用台湾本土对腐败感知的调查数据——“台湾清廉调查”(Taiwan Integrity Survey: TIS)的研究发现,台湾公民收看电视节目的个人偏好会影响到个体的腐败感知(Yu, et al. 2013: 76)。

第二大流派为“宽恕”腐败理论。这派理论认为,有可能公民即便知道政客和政府是腐败的,但是由于较高的经济绩效和可以得到其它现实的好处,如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少的税收等,依然会选择腐败的政客和政府。实证研究也发现,在民主国家,虽然选民有机会使用自己的选票把“混蛋”投出去(throw the rascals out),但依然经常出现腐败的政客可以得到更多选票而当选的现象。宽恕腐败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大多数选民会在政客的腐败程度和给自己带来的经济好处二者之间做“权衡”。

虽然以上研究已经在个体层面(非常不系统)和制度层面(仅仅强调了媒体)发掘出了一些影响民众腐败感知程度的因素,但目前的研究忽略了国家整体的制度层面因素对公民腐败感知的影响,由于大部分对于腐败感知的研究还是局限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之内,因此一些关键性的制度差异是如何影响普通民主的腐败感知的,并没有被揭示出来。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希望可以使用多层分析的方法,将国家层面的制度变异与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三、有条件的“宽恕”腐败:理论发展与核心假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比较政治研究开始使用多层分析的技术,把宏观制度层面的差异与微观个体层面的变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Anderson, & Singer 2008; Kedar, & Shively, 2005)。这一方法在比较政治学中的运用前景极为广泛,因为其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时髦技术而已,而是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即安德森等人所提出的“嵌入性公民”(nested citizens)理论:“民众是嵌入在一个可识别的背景环境之中的——也就是说,个体态度的形成和做出选择都是依托于各种不同的宏观—政治(或其它)环境(或背景)的”(Anderson, & Singer 2008: 568)。这一理论听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在多层分析技术运用之前,长期以来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大多是被割裂开来对待的。要么是纯粹从微观到微观,考察个体因素对个体态度和行为选择的影响;要么是从宏观到宏观,只考察国家整体层面的因素对国家整体状况的影响。多层分析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使得比较政治学可以把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数据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一) 民主与腐败感知:直接效应

从理论上来说,民主可以通过使政治权力多元化来减少公职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机会,同时增加政治决策的透明度,并且通过选票来使得政客由于担心落选或者无法连任而更加对选民负责(Rose - Ackerman, 1999)。但很不幸,民主在理论上可以抑制腐败的假设在经验证据上备受争议。在很多大样本的研究中,民主与腐败二者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结论。在费西曼以及阿黛斯的跨国数据分析中,民主与一个国家当年的

腐败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Ades, A. & Di Tella, 1999)。垂斯曼的研究有类似的结论,但是他通过对民主重新进行编码,把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年龄作为自变量,发现对腐败有显著抑制效应,因此他认为“有较长民主化历史的民主国家较为清廉”(Treisman, 2000, 2007)。洛克使用1982~1997年的面板数据,发现民主的年龄与腐败之间呈现出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Rock, 2009)。芒提拉和杰克曼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在政治竞争与腐败之间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腐败在独裁国家中要比在部分民主化的国家中低很多,但是一旦越过了那道门槛,民主实践就开始对抑制腐败产生作用”(Montinola & Jackman, 2002: 147)。

既然民主对于腐败的影响如此令人捉摸不定,可能引出的问题应该是:民主作为宏观的制度条件,与个体的腐败感知之间,在理论上和实证上是何种关系。我们认为,在今天的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内,民主化提高了一个国家民众的腐败感知,原因有两个:一是民主不是解决腐败的充分条件(Rose - Ackerman, 1998, 2001),民主化与民主转型为腐败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机会,使得民众感觉到政府及其雇员变得更为腐败了;二是媒体的自由化增加了腐败和高层政治丑闻的曝光率,这也会增加民众的腐败感知。

关于第一点,约翰斯顿提供了民主会加剧腐败蔓延的几大因素。在他对于腐败征候群的四分类中,其中三个都存在于民主国家之中。其中,成熟的民主国家可能会产生“权势市场”型的腐败,这意味着市场民主可能会提供更多的腐败机会,“政客可以作为中间人,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寻求合法或者不合法的租金和政治献金”(Johnston, 2005: 42)。而在另外两种类型中,“精英卡特尔”和“寡头与帮派”也都是嵌入在处于转型期或巩固期的民主政体之中的(Johnston, 2005: 42~45)。

在缺乏制约和权力平衡的条件下,民主化反而会比那些软威权政体带来更多的腐败问题。莫塔迪和罗伊发现,更为开放的政府系统带来了更多的寻租者,因为信息的流动更为畅通,同时也更容易接触到控制信息和资源的政府雇员(Mohtadi & Roe, 2003: 447)。基佛比较了老年的民主政体和年轻的民主政体,结果发现年轻的民主政体更为腐败,原因在于这些国家中的政治竞争者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兑现对选民的承诺,因此他们会寻求建立庇护体系,对选民做出超过自身能力的政治承诺,并且卷入到广泛的寻租活动中去(Keefe, 2007)。上述理论发现在一些亚、非、拉地区的案例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维兰德通过对拉美地区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基佛非常相似,拉美的民主化在一些国家催生出了“新民粹主义”,这些以新民粹主义自居的政治领导人利用腐败来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同时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庇护关系网络(Weyland, 1998)。

第二,民主化一般伴随着媒体的开放和自由化。已经有足够多的研究告诉我们,媒体自由化会提高民众对政府腐败的感知程度。有些学者通过对韩国的案例研究发现“随着民主化对媒体的开放,更多的腐败丑闻导致了腐败感知的膨胀,即便实际的腐败可能没有增加”(Schopf, 2011)。朱江南等人对于中国的研究从相反的方向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当地方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比较强的时候(也即对腐败案例的报道比较少),民众的腐败感知也会相应降低(Zhu, Lu & Shi, 2012: 10)。

基于以上对民主和腐败感知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再加上前人从各地区的实证经验得出的结论,我们将国家层面的假设设定如下:

假设 1: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环境, 会提高新兴民主化国家中公民对政府的腐败感知。

(二) 民主、主观经济评价与腐败感知: 民主制度的调节效应

在公民对腐败和反腐败的政治态度的研究中,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 公民真的会因为经济上的好处而宽恕政府的腐败行为吗? 其中比较主流的解释是“宽恕”腐败理论, 这派理论认为, 有可能公民即便知道政客和政府是腐败的, 但是由于较高的经济绩效和可以得到其它现实的好处, 如更多的工作机会, 更少的税收等, 依然会选择腐败的政客和政府。然而, 经济既是客观的, 更是主观的。上述研究比较注重的是民众基于自身客观经济状况的评价, 对民众对自身经济条件的主观评价的关注不足。在公民政治态度的研究领域中, 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 公民对政府行为和绩效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工具理性的评价基础上(Bratton & Mattes 2001; Norris, 1999; Rose, Mishler & Munro 2011)。而所谓工具理性, 指的是个体对自身经济状况的过去或者未来的一种主观评价, 并且依据这种评价来选择对政府的态度。显然, 如果民众的政治态度受到工具理性的强烈影响, 那么当其对自身的经济状况评价比较好时, 理应对政府的态度比较积极和正面, 而当自身的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 会对政府有更多的谴责和批判。康斯坦丁等人通过对希腊选举结果的分析发现, 集体性的经济好处——比如减税——会大大提高民众对政府的腐败容忍度(Konstantinidis & Xezonakis 2013)。温特斯在对巴西选举的研究中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社会上层阶级对政府腐败现象的态度比较温和, 而下层阶级对待腐败现象的态度则更为激进(Winters & Weitz - Shapiro 2013)。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将个体层次的核心假设设定如下:

假设 2a(H2a): 对自身经济状况评价比较好的公民, 对政府的腐败感知会更低。

虽然同样是基于工具理性对政府腐败感知的判断, 在威权政体下和在民主政体下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公民基于工具理性对政府腐败行为的宽恕程度受到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主制度的供给情况的左右。更为明确地说, 当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供给比较充分时, 公民基于工具理性对政府腐败行为的宽恕程度会更高, 而当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供给比较匮乏时, 公民基于工具理性对政府腐败行为的宽恕行为比较低。民主制度之所以会对公民的腐败宽恕产生这样的调节作用, 原因在于在一个民主制度供给较高的政体下, 公民可以使用手中的选票把自己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发泄到政客身上。而在非民主政体下, 公民会更加倾向于把对经济状况的不满诉诸整个政治体制本身, 而不是某个无能的领导人。因此, 与一个威权政体或者去功能化的民主政体相比, 在一个功能健全的民主政体中, 即便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份, 公民更不太会因为经济状况变差而谴责政府腐败。

与民主国家相反, 在威权国家, 经济责任通常跟国家的政体结构有更大的关系。威权政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体和统治精英的高度融合, 在大部分非民主政体中, 政府可以控制大量的经济资源并且滥用权力干预市场竞争。而普通民众和商业群体并没有很多可选择的渠道来影响政府的决策, 因此通过贿赂、建立政客之间的同盟网络等方式收买权力或者俘获政府的现象在威权国家里更为常见。于是, 当民众对经济绩效进行评价时, 很难区分到底是领导人个人的问题还是整个政治制度的问题。因此, 公民更容易将自身经济状况的好坏归咎于政体的优劣。于以上的理论推断, 我们将民主作为宏观背景对腐败感知的调节效应设定如下:

假设 2b(H2b): 在威权制度下, 公民基于自身经济评价对政府腐败的“宽恕”弱于民主制度下的公民。

为了更清晰直观地展示我们的理论和研究假设, 在图 1 中描绘了民主、主观经济评价和腐败感知三者之间的理论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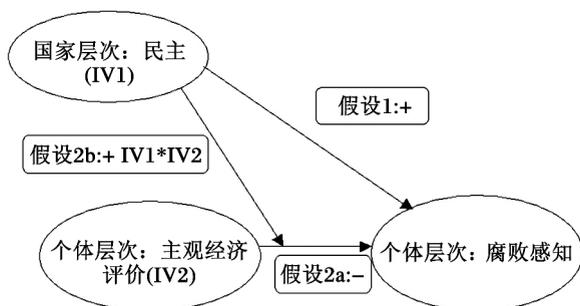


图 1: 核心假设与解释框架

四、数据、变量与测量

(一) 数据合并工作

为了能够在最大范围内验证我们的假设是否成立, 我们合并了亚洲舆情表、非洲舆情表和拉美舆情表三个区域的跨国调查数据。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这三个平台所发布的数据, 在数据搜集的过程中遵循了严格的统计调查和抽样规则, 是可以信赖的权威性区域研究数据; 二是这三个数据同属于世界跨国舆情表调查数据系列, 虽然有各自区域所关注的不同问题, 但是也有大量相同或者类似的问题, 如经济评价、政治信任、腐败感知、民主价值观等等, 这为我们进行数据合并的工作提供了可操作性。

我们进行数据合并的步骤如下: 首先在调查年份上选择最相近的年份, 这样可以尽量控制时间差异的影响, 其中亚洲舆情表数据为第三波(调查年份为 2006 ~ 2008 年), 非洲舆情表的数据来自第四波调查(调查年份 2008 年), 拉美的数据由于是逐年发布的, 因此选择了 2008 年的调查数据。其次, 我们把三套数据的问卷进行了仔细对比, 最后从中挑选出能够反映相同或者最相近意思的问题, 以及相同的人口学变量。在清理完数据之后, 我们分别在三套数据中进行重新编码, 使得编码的方向和取值一致, 最后把三套数据合并起来。

(二) 测量

腐败感知: 在三套舆情表问卷中, 对于“腐败感知”的测量并不完全相同。在亚洲舆情表中使用了两道问题来测量被访者的腐败感知: “你认为腐败和贿赂在地方政府中的蔓延程度如何?” 以及“你认为腐败和贿赂在中央政府中的蔓延程度如何?”。选项包括: “几乎无人腐败”、“较少人腐败”、“大多数人都腐败”和“几乎所有人腐败”。在非洲舆情表中, 对被访者腐败感知的测量更为细致, 使用了八道问题, 包括的对象有: 总统, 议员, 地方政府, 政府普通公务员, 警察, 税务官, 司法官员, 传统领袖。答案选项包括“没有人腐

败”,“一些人腐败”,“大多数人腐败”和“几乎所有人腐败”。为了与亚洲舆情表相匹配,我们选择对总统和议员腐败感知测量的两个问题,合并为对中央政府腐败感知的测量,而直接使用第三个问题用来测量对地方政府的腐败感知。对腐败提问最为笼统就是拉美舆情表,只有一道问题“如果把整个国家的政府雇员设想为100人,你认为其中有多少人是腐败的?把数字填入方框中。”答案是一个0~100之间取值的连续变量。由于对自变量测量取值范围的简单算术运算并不会影响到最后模型的显著性,因此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把三套数据的腐败感知指数重新编码,通过简单算术运算的方式得到一个取值区间在0~1之间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代表民众认为政府越腐败。

民主程度:为了保证最后的分析结果不是由于民主测量方法的问题引起的偏差,我们使用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学者较为常用的民主测量数据“民主与独裁”(Democracy and Dictators: 简称为DD)和政体IV(Polity IV)。DD是由普沃斯基等人发展的一个对民主进行二分法测量的数据库(Przeworski et al. 2000)。政体IV对于政体民主程度的测量则是连续的,把民主程度分为21分(从-10到10),同时使用五个指标来测量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政治参与的竞争性,政治参与的规范性,行政雇用的竞争性,行政雇用的公开性,以及对最高行政长官的约束等^①。

民主价值观:三套问卷中对于民主价值观的测量比较接近,在亚洲和非洲舆情表中,都使用了三道问题来分别测量民众对“议会选举”、“政党制度”和“军人干政”的看法,拉美舆情表中缺少对“军人干政”态度的测量,但是有前面两个相同的问题。这里我们的处理方法与对因变量“腐败感知”的处理相同,数值越大代表越认同民主价值观。

主观经济状况评价:对这一变量的测量在三套问卷中是相同的,就是“对于你的家庭来说,你如何评价自己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答案包括四个选项:好,一般,差,很差。为取值范围在1~4之间的定序变量,我们转换了编码方向,数值越大代表主观经济状况评价越好。

由于三套数据重合的人口学变量并不多,因此我们对于控制变量的选择受到了合并数据的限制,这不得不说是合并数据的一个劣势,即只能取三套数据中所共有的变量加以控制,但我们依然最大程度的选择了控制变量。首先是人口学变量,我们控制了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除此之外,由于前面提到媒体对于个体腐败感知有显著影响,因此我们还控制了“互联网使用频率”,由于大量关于腐败的新闻可能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因此我们认为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的人,越多接触到政府腐败丑闻,其腐败感知可能也越高。另外一个在研究腐败感知时经常被控制的变量是“人际信任”,或者说是“社会信任”,以区别于政治信任,由于从理论上来说,那些对他人较为信任的人,可能也更倾向于信任政府雇员,因此其腐败感知也会相应降低,与腐败感知之间应该是负相关关系。

五、多层线性模型与统计结果

为了验证上述两组核心假设,我们使用了多层线性回归方法来拟合模型(Hierarchical

^① 更多细节参见: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Linear Model: HLM) 这是当因变量为连续变量时进行多层分析最常用的方法。多层线性回归的优势在于,它不仅允许同时检验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个体层面核心自变量与国家层面核心自变量的交互作用。我们最后完整的模型设定如下:

$$\text{个人层次: } Y_{ij} = \beta_{0j} + \beta_{1j}^* \text{ 主观经济评价} + \beta_{2j}^* X + \gamma_{ij} \quad (\text{I})$$

$$\text{国家层次: } \beta_{0j} = \gamma_{00} + \gamma_{01}^* x + \gamma_{02}^* \text{ 民主程度} + \mu_{0j} \quad (\text{II})$$

$$\beta_{1j} = \gamma_{10} + \gamma_{11}^* \text{ 民主程度} \quad (\text{III})$$

在公式(I)中, Y 为个体对所在国家的政府的腐败感知水平,其中主观经济评价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个体层次的自变量,而 X 则为个体层次所有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民主价值观、互联网使用频率、社会信任等。在公式(II)中, x 代表在第二层次也就是国家层次的所有控制变量的影响,包括人均 GDP、腐败控制、出版自由等。而公式(III)则表示跨层次交互项的影响,即第一层次主观经济评价对腐败感知的影响系数受第二层次国家民主程度的调节效应。在表 1 中我们报告了使用这一方法拟合模型的结果。

表 1: 腐败感知的多层线性模型

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	模型 1	模型 2 (HLM)	模型 3 (HLM)	模型 4 (HLM)	模型 5 (HLM)
固定效应 个体层次					
性别 (男性 = 1)		-0.0043** (0.0021)	-0.0046** (0.0021)	-0.0044** (0.0021)	-0.0044** (0.0021)
年龄		-0.00034*** (0.000076)	-0.00035*** (0.000076)	-0.00030*** (0.000078)	-0.00031*** (0.000078)
教育程度		0.016*** (0.0017)	0.017*** (0.0017)	0.018*** (0.0017)	0.018*** (0.0017)
互联网使用		0.022*** (0.0028)	0.023*** (0.0028)	0.023*** (0.0028)	0.023*** (0.0028)
人际信任		-0.038*** (0.0024)	-0.038*** (0.0024)	-0.036*** (0.0024)	-0.036*** (0.0024)
民主价值观				0.035*** (0.0072)	0.035*** (0.0072)
自我经济评价			-0.016*** (0.0016)	-0.018*** (0.0017)	-0.018*** (0.0017)
国家层次					
民主程度 (Polity IV)		0.013*** (0.0047)	0.0083* (0.0048)	0.014*** (0.0047)	0.015*** (0.0037)
人均 GDP(log)					0.085*** (0.011)
腐败控制					-0.22*** (0.023)

续表 1

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	模型 1	模型 2 (HLM)	模型 3 (HLM)	模型 4 (HLM)	模型 5 (HLM)
出版自由					-0.00026 (0.0011)
跨层次交互项					
民主*自我经济评价			0.0016*** (0.00023)	0.0016*** (0.00024)	0.0016*** (0.00024)
截距	0.511*** (0.022)	0.44*** (0.035)	0.48*** (0.035)	0.46*** (0.035)	-0.20** (0.093)
随机效应					
截距	.026*** (.005)	0.021*** (0.004)	0.021*** (0.004)	0.021*** (0.004)	0.006*** (0.001)
N(国家)	52	49	49	49	49
N(个体)	60396	52408	52408	52408	52408
Wald chi2	—	743.8***	789.9***	888.8***	1039.4***

注: 括号中为标准误;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首先,模型 1 为我们的完全非条件模型。拟合这一模型的目的在于计算腐败感知的组间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ICC)。ICC 的计算公式为:

$$ICC = \frac{\tau_{00}}{\tau_{00} + \sigma^2} = \frac{\text{国家层次方差}}{\text{国家层次方差} + \text{残差值}} = \frac{0.026}{0.026 + 0.061} \approx 0.30$$

上面的计算结果告诉我们,对于腐败感知来说,大约有 30% 的差异来自于国家层次的区别。一般来说,对于多层分析来说,当因变量的差异有超过 20% 的因素是必须由第二层因素来解释的,那么就必须使用多层分析模型,而不是使用简单的单一层次的线性模型来分析。

在接下来个 4 个模型中(模型 2-5),我们使用政体 IV 作为测量民主程度的数据来源。其中,模型 2 为我们进行参数比较的基准模型,因此在其中的个体层次上只加入了控制变量,在国家层次上加入了民主程度。结果显示,在个体层次上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人际信任的同时,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与个体的腐败感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初步证实了我们的假设 1,即随着民主程度的提高,个体的腐败感知反而会更高。但为了证明这一结论是稳健的,在模型 2 的基础上,我们在模型 3 中增加了核心自变量“自我经济评价”和民主与自我经济评价的交互项。HLM 回归的结果表明,在个体层次上,自我经济评价与腐败感知之间是显著负相关关系,即认为自身经济状况较好的个体,会倾向于认为政府没有那么腐败,在这里以往的“宽恕”腐败理论得到了验证,也证实了我们的假设 2a。与此同时,民主与自我经济评价的交互项在模型中的符号为正,这说明民主制度加强了自我经济评价对腐败感知的负效应,于是我们的假设 2b 也得到了确证。

为了能够更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的假设,我们在模型 4 中加入了个体层次的民主价

值观变量,结果依然符合理论部分的预期。在模型 5 中我们又进一步在国家层次上控制了更多可能影响腐败感知的因素,包括人均 GDP(log)、世界治理指数中的“腐败控制”,以及来自自由之家数据库的出版自由。结果表明,民主程度在控制更多的国家层面自变量的情况下依然在最高水平上显著,且方向是稳定的。

另外,HLM 的回归结果还告诉我们一些其它信息,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也体现出了稳定的显著性,其中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会倾向于认为政府更腐败,这可能是由于教育程度越高,个体的权利意识和政治知识都会提高,因此批判性也会加强。而互联网使用也体现出了正相关的作用,说明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互联网的普及和扩散都使得个体可以接触到更多关于政府的负面新闻,因此也会认为政府更加腐败。人际信任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同,更加信任陌生人的个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会更高,同时批判程度会更低,因此与腐败感知之间是显著负相关关系。民主价值观的作用也是符合常理的,无论在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民主价值观越强的个体,对政府民主程度的要求都会更高,因此也更具批判精神,因此与腐败感知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解释模型中的交互项,我们遵照布拉姆博等人的建议(Bramber et al. 2005)在模型 5 的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制作了自我经济评价对腐败感知影响的边际效应图(图 2)。从图 2 中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拥有较高自我经济评价的个体确实对政府的腐败感知更低,无论国家的民主程度如何,这证明“宽恕”腐败理论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是适用的。但是有趣地是,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程序性民主程度的提高,人们对政府腐败行为的“宽恕”程度也在提高。反过来说,在非民主国家,民众出于自我经济评价的腐败“宽恕”程度更低,这实际上告诉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仅仅依靠发展经济来提高政权的合法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切实地控制住政府的腐败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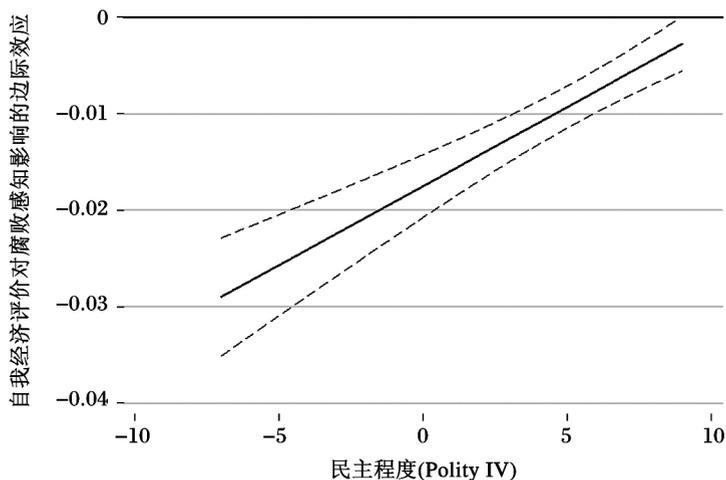


图 2: 民主与自我经济状况评价的边际效应

六、结 论

虽然目前的研究大多认为民主可以让民众更加信任政府,但是我们的研究更为细致地展现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环境在影响个体感知的两面性。在直接效应上,我们的研究发现,个体对政府腐败的感知程度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嵌入”在宏观制度环境之中的,在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腐败控制程度和出版自由程度的情况下,民主程度越高反而会让个体更倾向于认为政府是腐败的。根据前人的研究,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在亚洲、非洲和拉美众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过程中,由于伴随着新形态的、更为“可见”的腐败形式的出现,以及公民基于民主价值观提高带来的更高的批判性,会引来对政府腐败现象更为强烈地谴责。

然而,当我们检验民主作为制度环境对于个体“宽恕”腐败的条件效应时,又发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如果说在前面的直接效应上民主展现了其“严厉”的一面,那么在条件效应上其又显露出“仁慈”的一面。即个体基于主观经济评价对政府腐败行为的“宽恕”程度,在民主政体下要比在威权政体下更高。这个结果实际上是与前人的研究相吻合的,即在民主政体下民众更少把个人的经济状况归结于政体本身,而更多地归咎于某个领导人的无能。

我们的研究还暗示,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民主化时间不长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民众对政府的政治态度对于民主能否巩固下来是至关重要的,民主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经常由于和政治腐败联系在一起而备受诟病。今天,在亚洲、非洲和拉美存活下来的民主政体无不历经曲折和磨难。与此同时,威权政体所采取的“用户友好型”策略大大增强了这些政体的韧性,民主和威权之间的竞争正在变得越来越激烈。然而,我们的研究还发现,民主在稀释民众给予经济理性对政府的谴责上拥有更大的优势。民主对腐败感知影响的两面性告诉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轻易地对民主和腐败感知的关系下任何简单直接的结论。

参考文献:

- Ades, A. & Di Tella, R. 1999. “Rents,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4): 982 - 93.
- Anderson, C. J. & Matthew, M. S. 2008. “The Sensitive Left and the Impervious Right: Multilevel Models and the Politics of Inequality, Ideology, and Legitimacy i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 (4/5): 564 - 99.
- Arnold, Jason Ross. 2012. “Political awareness, corruption perceptions and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 *Acta Politica*. 47(1): 67 - 90.
- Bratton, M. & Mattes, R. 2001.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Africa: Intrinsic or Instrumental?”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3): 447 - 74.
- Chang, E. C. C. & Chu, Y. H. 2006. “Corruption and Trust: Exceptionalism in Asian Democrac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8(2): 259 - 71.
- Davis, C. L., Camp, R. A. & Coleman, K. M. 2004. “The Influence of Party Systems on Citizens’

- Perceptions of Corruption and Electoral Response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7: 677 – 703.
- Johnston , M. 2010. *Syndromes of Corruption: Wealth , Power ,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dar , O. 2005. “How Diffusion of Power in Parliaments Affects Voter Choice.” *Political Analysis*. 13: 410 – 29.
- Keefer , P. 2007. “Clientelism , Credibility , and the Policy Choices of Young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4) : 804 – 21.
- Konstantinidis , I. & Georgios , X. 2013. “Sources of Tolerance Towards Corrupted Politicians in Greece: the Role of Trade Offs and Individual Benefit.” *Crime , Law and Social Change*. Published online: 22 Sep. 2013.
- Kurtz , M. J. & Schrank , A. 2007. “Growth and Governance: Models , Measures , and Mechanism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9(2) : 538 – 54.
- Maria , W. de. 2008. “Measurements and Markets: Deconstructing the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21(7) : 777 – 97.
- Mohtadi , H. & Roe , T. L. 2003. “Democracy , Rent Seeking , Public Spending and Growth.”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7(3 4) : 445 – 66.
- Montinola , G. , Jackman , R. 2002. “Sources of Corruption: a Cross – country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 147 – 70.
- Norris , P. 1999. “Introduction: The Growth of Critical Citizens?” in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 edited by Pippa Norri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lken , Benjamin A. 2009. “Corruption perceptions vs. corruption real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3: 950 – 64.
- Pharr , S. J. & Putnam , R. D. (ed.) . 2000. *Disaffected Democracies: What’s Troubling the Trilateral Countries?* Princeton ,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 Adam , Michael Alvarez , Jose Antonio Cheibub & Fernando Limongi.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 – Being in the World , 1950 – 199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ck , M. T. 2008. “Corruption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5(1) : 55 – 75.
- Rose – Ackerman , S. 1999. *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Causes , Consequences , and Refo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e – Ackerman , S. 2001.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Democratic Structur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ruption* , edited by Arvind K. Jain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Rose , R. , Mishler , W. & Munro , N. 2011. *Popular Support for an Undemocratic Regime: The Changing Views of Russia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opf , J. C. 2011. “Following the Money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Democracy on Corruption: The Case of Kore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1: 1 – 39.
- Seligson , M. A. 2002. “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Regime Legitima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Journal of Politics*. 64(2) : 408 – 33.
- Treisman , D. 2000.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a Cross – 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6(3) : 399 – 457.

- Treisman, D. 2007.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From Ten Years of Cross-national Empirical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0: 211 - 44.
- Warren, M. E. 2004. "What does Corruption Mean in a Democra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2): 328 - 43.
- Winters, M. S. & Weitz - Shapiro, R. 2013. "Lacking Information or Condoning Corruption? When Will Voters Support Corrupt Politicians?" *Comparative Politics*. 45(4): 418 - 36.
- Yu, C., Chen, C. M. & Lin, M. W. 2013.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 Taiwan: Reflections upon a Bottom-up Citize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79): 56 - 76.
- Zhu, J. N., Lu, J. & Shi, T. J. 2013. "When Grapevine News Meets Mass Media: Different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Popular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in Mainland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6(8): 920 - 46.

Democracy, Economic Assessment, and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Li Hui, Huhe Narisong & Tang M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corruption. By making a multilevel analysis with the Hierarchical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based on our combined data set of Asian, Afro and Latino Barometer Survey, we find: democracy has double faces as the contextual conditions on coloring ordinary citizens' corruption perceptions. On aggregated level, democracy has positive effect on increasing citizens' average level of corruption perceptions. However, in conditional models, democracy decreases democratic value's positive impact on corruption perceptions, and increases self-economic evaluation's negative effect on corruption perceptions.

Key words: Democracy; Economic Assessment; Corruption Perceptions; Multilevel Analysis

(责任编辑: 李砚忠)